深入理解“党内政治生活”的丰富内涵

“党内政治生活”从首次提出到现在被使用的频次越来越高，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内涵非常深刻丰富，必须从多方面、多层次深入理解，以进一步提高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贯彻落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求的自觉性。

□ 齐 彪

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重要论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其关键词“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因此，我们要从“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来源、演变、基本含义，及其新的时代特点等方面，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党内政治生活”的来龙去脉

深入理解“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必须对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来看，“党内政治生活”的提法，最早见诸列宁1915年5月发表的《空泛的国际主义破产》一文。列宁在批评有人“对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时使用了这一概念。“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实际是指列宁提出并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我们党最早使用“党内政治生活”概念是蔡和森。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的报告，系统回顾了我们党从成立到1926年的“党内政治生活”状况，还涉及“党的政治生活”“党的生活”“党内的生活”等概念。这些概念大致与后来使用的“党的建设”属于同一范畴。

正式把这一概念应用于党的建设要求的是毛泽东。他在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古田会议成为我们党开展严格认真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源头，但其后“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概念在较长时间并没有运用开来，“党的生活”“党内生活”等相近概念的使用则没有间断。经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包括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初步形成。

首次在党内法规文件中使用“党内政治生活”这一科学概念，是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一《准则》既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又对党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进行了归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丰富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党内政治生活”遂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范畴。

在“党内政治生活”加上“严格”“严肃”等强调词语的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6日，即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第二天，习近平同志署名发表的《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明确指出：“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此后又在多个场合讲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2016年6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就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进行了第33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就该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从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党内政治生活”从提出到使用，从党内生活政治化到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形成，从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到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课题，“党内政治生活”被使用的频次越来越高，成为党的建设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

“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含义

“党内政治生活”的含义，不同时期有不同理解。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新论述，为正确把握这一问题提供了遵循。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界定“党内政治生活”。

一是从政党一般属性来看，作为政治集团的任何政党都有其各自的党内政治生活，这是其调节党内关系、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政党自身生活的政治要求时指出：“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成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由此可见，党内政治生活，是政党自身建设共同规律的要求；自身没有政治生活的集团，不能称其为政党。

二是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殊属性来看，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他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不在于有没有政治生活，而在于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内政治生活，就应该是严肃认真的；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是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具体属性来看，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讲话中指出的，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政风的“净化器”。这一重要论述，既指出了作为政党的党内政治生活的一般功能作用，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内政治生活的特殊要求，也反映了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成功经验，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对“党内政治生活”最权威、最全面的界定，意义非常重大。

厘清“党内政治生活”含义，还必须进一步区分其与相近概念的关系：一是“党的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活”。一般来说，“党的政治生活”包括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活，在一定语境下二者有时又相互通用。二是党的生活、党内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活。这三个概念是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表述，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使用“党内政治生活”概念，是为了强调政治是党的生活、党内生活的固有属性。三是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活。二者不是并列关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特点

党内政治生活在不同时期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新的时代条件下同样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深入理解党内政治生活的丰富内涵，必须着眼于当前，把握其新的时代特点。

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条件，与1980年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工作重心转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启动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建党59年、执政31年到建党95年、执政67年，等等。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考验、危险比过去更为复杂。一个时期以来，管党治党方面出现了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等突出问题，严重损害着党的机体，必须下大力去除并防止复发。

如果说，1980年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根本着眼点是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防止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现象再次发生，那么现在要着重解决的，就是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宽松软”等突出问题，为此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如前所述，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政治生活一直讲严格讲认真，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又有着更为严格的特殊要求，无论是“严”的力度还是“严”的覆盖范围，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始终，构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活的鲜明时代特点。

“严”的实质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就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也是把二者作为同义语在不同语境下使用。首先是加强，就是要恢复和发扬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其次是规范，不仅要严之有理，而且要严之有据，严之有度。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按照各项原则和规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既要严起来解决问题，又决不重犯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通过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严”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要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决根治一个时期以来思想散、政治弱、组织软、纪律松、作风坏等削弱和败坏党的领导的顽瘴痼疾，使党身强体健，始终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意义极为重大。坚持党的领导，在当前最根本的就是，坚决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严”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层层立标杆、作示范。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八项规定，带头讲党课，带头参加学习研讨，带头参加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为全党作出表率。同时坚持抓好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加强对执行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决策、选人用人、廉洁自律等情况的监督，强化问责追究等。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的重要原因。

“严”的覆盖范围涉及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在党内政治生活上的要求和体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重点的同时，必须注意其他各个方面，既抓重点又兼顾一般、既抓大又抓小、既治标又治本、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集中教育与专题性经常性教育密切配合、端正党风政风与扭转社风民风相互促进、教育引导和纪律约束紧密结合、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有机统一，有力整合了促进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向积极方向转变的各要素各环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涉及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全面理解、全面贯彻执行。

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理论笔谈

陈云醇厚的人文素养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陈云是“搞经济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有独具特色的文化思想，有着醇厚的人文素养。

□ 蒋永清

“马背上”的读书人

陈云勤奋刻苦，喜欢读书，既是革命家，也是读书人，可以说是“马背上”的读书人。他虽然从小家境贫寒，但却天资聪颖，喜爱读书。从上颜安小学到去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他都是因为读书优秀，而得到贵人相助，从乡下走向都市，从小我走向职业革命家。

读书伴随着陈云的革命生涯。延安时期，环境相对稳定。他把读书看作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在毛泽东的启发和建议下，他再次认真研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他以革命家的风范组织了学习小组，一本一本地读原著，并请人辅导，进行讨论，共同提高。学习小组从1938年至1942年坚持了整整5年。夫人于若木说：他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程度。

读书是陈云的精神支柱。“文革”期间下放到江西“蹲点”，他把可支配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经常是废寝忘食。孩子们探望他时，他说得最多是读书问题。他组织了家庭学习小组，传授读书方法。陈云是读书人，读书人自然很爱书。除了马列经典著作外，陈云喜爱中国古籍，深谙其积淀的民族文化遗产。晚年时，他以其在党内的决策地位，推动了中国古籍整理工作。在陈云的努力下，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读书人笑逐颜开，弹冠相庆。武汉大学黄焯教授说“要向陈云同志行九叩之礼”，这才“可以代表我们的心情”。

既是读书人，那就讲究尊师重教。陈云对在人生关键时刻关心、扶持、培养过自己的老师常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心情。他和部分同学集资为小学校长树碑纪念。他尊师重教体现出读书人特有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气节。他的女儿过去是小学教师，以后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陈云对此不赞成，劝女儿“归队”。女儿毅然回到自己的母校，当了一名普通中学教师，一直干到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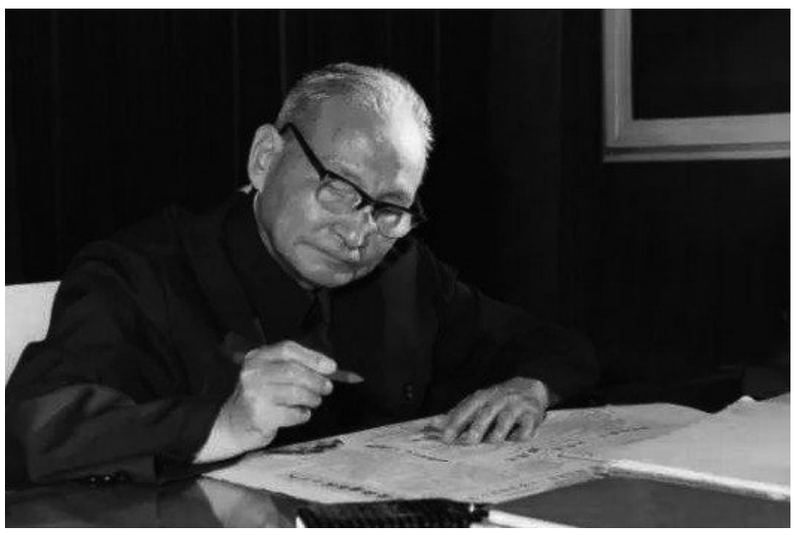
作为政治家，陈云提出一系列重视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具有读书人特有的真诚。1984年9月，当他看到一份高中毕业生很少愿意报考师范院校的材料后，忧虑至深，当即指出要采取措施帮助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解决实际困难，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弥留之际，当他从新闻中听到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即委托身边工作人员从自己稿费中取出5000元，捐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当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读书人坦荡的胸襟。

造诣深的书法家

陈云爱好广泛，尤其是他的书法达到很高造诣。

陈云与书法结缘源于从小写毛笔字。他回忆说：“我整整练了十年，小学三年，高小三年，以后又练四年。”可能出于对自己练字经历的感悟，他在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极力提倡全国少年儿童 “从小要练好毛笔字”。1984年9月，他建议教育部门“小学要重视毛笔字的训练”。教育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小学生的写字训练。

从小刻苦的书写训练，为陈云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功底。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和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他没有时间专门练习书法，但他的字一直写得很好。直到80岁高龄，他又重操翰墨，每天作为必修课，持之以恒，练了整整10年，留下大量书法作品，也留下了许多佳话。



陈云每天坚持练字1个小时，后改为40分钟。开始是坐着写，后来是站着悬肘写。开始用笔甩不开，后来逐渐运用自如，书艺精进，“有飘逸感了”。练字时，他往桌前一站，平心静气，骑马姿势，提起毛笔，脚不动，气不喘，手不颤，完全沉浸在忘我的超然境界。有一次，他书写《枫桥夜泊》诗，整幅作品一气呵成。在写“声”的繁体字最后一竖时，他一笔拉出有20厘米。写完后，他指着这一笔，挥臂作了一个似挥拳撞钟的动作，同时口中发出悠长的一声“当”，仿佛夜半寒山寺的钟声响得很长、传得很远。

陈云钟情书法，经常将条幅赠予友人、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书法内容多是他人生的思考与心得、个人心境与情怀的抒发，也是对受赠人的一种勉励和期望。他曾书写两幅条幅赠送长子陈元，一条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元多年后深情地回忆说：“这两幅字就像父亲的一双眼睛盯着我，时刻提醒着我、告诫着我、激励着我：不管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经得住群众的检验，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作为书法家，陈云也像其他文化人那样“算计”过他的作品的市场价值。1984年12月，他在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前，将事先写好的两张条幅赠送给陪同前来的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钱其琛高兴地说：“我今天得到的字可是千金难买呀！”陈云逗趣地说：“我写的字一块钱一张就行了，这我可就成万元户了。”那个年代，万元户可是了不起的“土豪”。回到家里，谈及这个话题，陈云幽默地算了一笔账：“我一天写十三四张，就算赚10块钱，一年3000多块钱，3年就成万元户了，老汉可以卖字为生了。”

其实，陈云对自己的作品是相当严肃和谨慎的。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他的字到荣宝斋去装裱，被一个外国人看见了，这个外国人说：“我给你一万美金，把这张字卖给我吧。”这位工作人员说不卖。陈云得知此事后说：做得对，我的字不能卖。他身上有着文化人的那股清流意识，有缘分的无偿赠送，无缘的千金不卖。

评弹界的“老听客”

陈云出生在丝竹音乐广为流传的江南水乡，盛行于家乡的评弹影响了他的一生。少年陈云听着“戡壁书”，在艺人的娓娓道白和丝弦弹唱中度过艰辛时光。尔后，戎马倥偬，治国理政，没有时间听。再次接触源于养病。陈云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先后两次到南方养病，听听评弹，觉得对养病有好处。本来头脑发胀，听听书就好些，这样又重新听了。”他风趣地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常为他搞录音带的何占春和修录音机的陈继亮是“保健委员”“半个医生”。他听了大量书目，广泛接触艺人，钻研曲艺规律，发表精当意见，被评弹界尊称为“知音”“老听客”。

陈云听评弹有艺术家的“范儿”，并且有独到的鉴赏力，留下丰富的真知灼见。1983年12月出版了经他本人审定的《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收入1959年至1983年的部分谈话、文稿和通信40篇。1997年6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增补了有关文稿11篇，约8万字。陈云听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他钻研之深，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有一年他听了1700多回书，听过的都作了笔记，包括每回书的时间、内容梗概、特点和问题等。正因为这种深入钻研的文化人的工作方法，他提的意见都非常中肯，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评弹艺术的发展方向上，陈云有着文化人执着而纯洁的理想追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评弹一度出现上座率不佳、经济效益差等现实困难。经过深入思考和调查，1981年春天，他与时任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谈话，以他卓越的洞察力逆势提出：“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出人”就是要培养新的文艺界人才，“出书”就是不断推出有价值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走正路”就是文艺人和文艺作品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这就是陈云坚守理想主义精神家园的坚强秉性。

陈云与评弹结缘至深。1994年5月，陈云住进北京医院，病房一角放着他收藏了一生的700多盘磁带的评弹作品。只要病情稍好一点，他都会听听。去世前一天，他听了一盘评弹录音带《一往情深》。吴侬软语，伴着琵琶清脆。他神态安详，静静地听着，静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历史担当，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正如陈云的经济思想、党建思想、哲学思想一样，在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今天，他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思想，同样是党的宝贵财富，历久弥新。

党史人物